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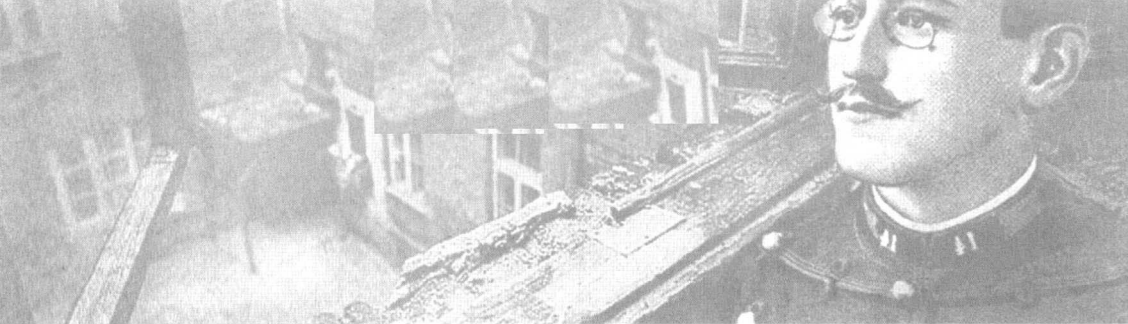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F 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

[美] 迈克尔·伯恩斯 / 著 郑约宜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

[美] 迈克尔·伯恩斯 / 著

郑约宜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 (美) 伯恩斯著; 郑约宜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2
ISBN 7-5343-7332-8

I. 法... II. ①伯...②郑... III. 德雷福斯案件
(1894) IV. K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0626 号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BEDFORD/ST. MARTIN'S,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Copyright © 1999 by Bedford/St. Martin'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贝德福德 / 圣·马丁出版社 (纽约和贝辛斯托克) 首次出版,
自 1999 年起所有版权为贝德福德 / 圣·马丁出版社所有。
图字: 10-2005-264

出 版 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 版 人	张胜勇
书 名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作 者	[美] 迈克尔·伯恩斯
责任编辑	王永祥 浦 渊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 本	940mm × 64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发 行 热 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1899年的夏天,一名英国记者在环顾全球之余,决定把焦点放在一名法国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这名被误判叛国罪的犹太炮兵团军官是当年“世界上最有名的人”。有这种看法的并不止这名记者,一名法国作家便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人所共知,是……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此外,19世纪末正值出版业蓬勃发展之际,出版刊物数目之多,前所未见,这些刊物创造了德雷福斯的声誉,并且尽量利用紧张的局势在人们激动的情绪上火上加油。然而,有关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审讯、公开拔阶、永逐魔鬼岛、恶名昭彰的重审等消息,是依靠古老的网络传播的;小贩、神父、犹太教士和流动农工把消息带到村子、农庄及少数民族聚居处。1900年后,当“事件”已从头条新闻淡出之后,德雷福斯的名字仍不时发出回响。一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描写得淋漓尽致的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回想起那名成为受苦与生还象征的军官时写道:“我想象我是德雷福斯,身系囹圄,如在陷阱,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受尽唾骂诋毁。衣衫华丽的贵妇尖声喊叫,用阳伞戳我的脸。”^①

这本记录史旨在介绍德雷福斯事件的始末及其历史遗产,时间涵盖自1894年德雷福斯上尉被逮捕至左拉(Emile Zola)对法国陆军提

^① G. W. Steevens, *The Tragedy of Dreyfu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899), p. 42; Charles Péguy, *Notre jeunesse* (Paris: Gallimard, 1993), p. 285; Yevgeny Yevtushenko, “Babi Yar”, in *A Hero for Our Time*, Moshe Decter, ed. (New York: Academic Committee on Soviet Jewry, 1970), p. 37.

出严厉控告《我控诉》(*J'Accuse*)的百年纪念 1998 年为止。英国史学家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ey)说:“有意义的题目永谈不尽。”这起事件证明了这个观点。事件的参考书已超过一千两百种,此外还有电影、戏剧、诗以及一出三部曲歌剧。有了这些庞大的参考资源,在取材方面,这本简洁的记录史是有其特别价值的。这本书可作为学生课外读本,它收录了少为人知却包含重要数据的文件。它依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概述一百年来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问题与争论。

德雷福斯事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对抗,个人与国家、文人政府与军方当局、议会政治与群众政治、对一般人性的信念(不论是宗教的或俗世的)与现代种族主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指出,反犹太主义的崛起是 19 世纪后期法国的一种政治武装,并且认为德雷福斯事件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上演的一出剧目的彩排”。最近,评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则界定此事件为“国家、种族、宗教接受它们现有冲击的第一刹那”^①。

然而,历史不只是乍现与象征,而是有关人们身处之时与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德雷福斯事件确实是法国第三共和历史中的一起重要事件,同时也是 1789 年大革命导致的内战一百年后仍得不到解决的明证。无论是支持或反对德雷福斯的公民,都以同样的热忱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法国的光荣——而相互攻讦。他们并非对爱国持有不同观点,而是对国家的过去与应有的本质、对检验归属认同的看法意见分歧。对德雷福斯阵营(即支持德雷福斯无罪者)来说,军队与教会代表的是现代及世俗国家中的反动堡垒;对反德雷福斯阵营来说,他们自身就有如国家处于社会动荡及内忧外患之际的安定要塞。当德雷福斯阵营把“质疑之责”放在“服从之责”之上时,反对者则敬重既有的秩序,并保护被丑闻削弱的军方。楚河汉界经常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内战——即使是较不血腥的——就不是如此了,而这起事件则打破了每一条成规。不是所有

^①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vest, 1973), p. 10; George Steiner, “Totem or Taboo”, *Salmagundi* 89—90 (Fall 1990-Winter 1991), pp. 385—398.

的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都反对德雷福斯,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反神职人士都站在德雷福斯这边。有勇气、有所惧、有才能、有野心、不宽容及有善意的男男女女组成了双方阵营,有些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启蒙的阳光乍现,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混乱的长夜,然而大家都引用它来为自己的使命辩护。

事件的催化作用非常深远。奥地利记者赫策尔(Theodor Herzl)在尚未目睹上尉被公开拔阶前,就已想象以色列以自治的形式重生;但是当群众在人权的摇篮里大叫“犹太人该死”时,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随即成形。虽然不少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已接受了议会体制,但是这起事件改变了他们不参与资产阶级政权的纲领,并且送了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进入第三共和的内阁。自1789年以来,政教分离已被列入国家议程,并且被德雷福斯阵营视为对抗反动过往的战斗,最后终于在事件的直接影响下成为法律。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一向为社会正义而奋斗,那么德雷福斯的案件表明他们已变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大批作家、艺术家、教授等离开象牙塔,以请愿书为武器,加入了事件的先锋部队。

最后,德雷福斯案无法摆脱与新闻、政治漫画及电影史的联系。1899年,第一部系列电影(为时15分钟,算是最长的)在巴黎一间摄影室内的绘画背景前拍摄。从反犹太主义的滑稽漫画,到过分奉承德雷福斯阵营战士的描绘,数以千计原为传统艺术的石版画、素描、木刻及油画当时则具现代用途;不过,双方都将主力放在印刷上。一代以前的教育改革培养出更多识字的人,因而为双方提供了大量读者,他们同时接收消息与煽动。学者正在辩论新闻界究竟是历史的“制造者”抑或“产品”,但无疑地,19世纪末的记者改良了辩论法,使它成为一种“攻击艺术”,这种艺术协助谴责德雷福斯,同时协助拯救德雷福斯。^①当年不少人——包括极负盛名的小说家左拉——把德雷福斯案和一出马拉松戏剧相比,这出戏剧有许多幕、无数个中场休息,但永不

① Jean-Pierre Peter, “Dimensions de l’Affaire Dreyfu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6 (November-December 1961), pp. 1141—1167; Richard Griffiths, *The Use of Abuse: The Polemics of the Dreyfus Affair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Berg, 1991), p. 3.

落幕。在这些引人入胜、充满磨擦的永恒教训中,德雷福斯上尉的一位早期盟友说出最重要的一点: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重要的”^①。

^① Bernard Lazare, 引自:Péguy, *Notre jeunesse*, p. 286。

目 录

1	前 言
1	时代背景
21	逮 捕
39	审判与流放
58	叛国与阴谋
83	我 控 诉
119	高等法庭
145	世界博览会
160	回响与历史遗产
186	附 录 (一)
193	附 录 (二)
198	参考书目

时代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的惨重杀戮史无前例,只有在大战后,法国人才回顾起19世纪的日暮风华,并称之为美丽年代。他们怀旧反省所做的结论看来部分是对的。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屈辱战败后,欧洲列强维持着相对的和平,虽然帝国间的竞争预示了新冲突的危险,但19世纪末的全面战争只发生在遥远的地区,如东亚的半岛、太平洋与加勒比海岛屿、南非尖端一带等地区。19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经济蓬勃发展,这种盛况至少持续了12年,直至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宣布成立。法国战败赔款给德国的速度较其在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战场上行军为快,而法国的银行——在国外资助苏丹及俄国沙皇,在国内援助制造业与农民——很快便跻身于国际主要金融机构中。重建巴黎、完成兴建首都大歌剧院与巴黎林荫大道,这些文化成就造就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黄金时期,也同样持续到新共和时代。学术界与新潮艺术家描绘多姿多彩的闲暇活动,例如布洛涅(Bois de Boulogne)的赛马、塞纳河畔的划船派对,以及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艾菲尔(Gustave Eiffel)那座引起争论、强调法国革命百年纪念的铁塔所在地。巴黎赢得了“19世纪之都”的美誉。^①

然而,从法兰西第三共和诞生至德雷福斯事件达到高峰期间,法

^① “巴黎,19世纪之都”这句话就如同“美丽年代”,皆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见:Walter Benjamin,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pp. 146—162。

国实际上正与自己交战。在 1870 年至 1871 年的冬季与春季,法国的临时政府一方面与德国交涉,另一方面则与巴黎人搏斗。由极不安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市民叛乱、反德占领的爱国抗议和随意抢劫所组成,这场巴黎民众的暴动以巴黎公社闻名——令人联想到大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名字——在 1871 年 5 月以为时一周的血战收场。法国军队从附近的凡尔赛进军巴黎,就地处决至少两万名巴黎居民,而被关入监狱和放逐的人则将近两倍。类似的冲突也在其他省份的城市里发生,从里昂(Lyons)到波尔多(Bordeaux)都有。若说巴黎公社没有实现平等共和的愿望,却也留下一项重要的遗产:社会主义者从此尊敬它的回忆,而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君主主义者或温和的共和主义者,都害怕历史重演。巴黎公社,说它是圣人头上的光环也好,是使人不寒而栗的幽灵也好,它飞越了 19 世纪的终点。^①

1875 年,国会以微弱优势通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宪法,两年后修订选举总统的规定。5 月 16 日的危机并未中止君主制度的命运(奥尔良派成员[Orleanist]与波旁[Bourbon]王朝继续声称保有王位),但是这场危机标志着温和共和派的胜利与总统权力的式微。政府的领导人总理与其内阁日渐负起制定与施行公共政策的责任,而下议院国民议会则成为法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至 19 世纪 80 年代,中立派的共和主义者(被讥为机会主义者)要面对的不只是保皇派的不满,外国货物输入引起的竞争加上农业危机,显示出法国的经济发展不够平衡,新的民众抗议随之而起。社会主义派人数大增,有组织的罢工在 1885 年只有一百起,但是在 1894 年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前夕已增至六百余起。

当机会主义派政府受到日益严重的攻击时,一位野心勃勃的陆军部长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将军以人民救星之姿出现。这位双颊蓄须、胸挂勋章、干劲十足的将军离开内阁(1887 年新政府上台),从

^① 有关巴黎公社及其当时对后世的影响,请参见:Susanna Barrows, *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 and passim。

事群众政治,他因替罢工的矿工辩护、答应军队民主化,获得激进派赞许;但同时,保皇派和拿破仑主义者正冀望对他们憎恨不已的共和做出致命一击,因而秘密大量给予将军援助,期望他进行一场军事政变。1889年1月,在布朗热将军笃定获选为巴黎代表进入国民议会的当晚,支持者大叫:“艾利赛宫!”怂恿“胜利将军”进驻总统府。但当他还举棋不定时(他比他的支持者更尊敬宪法),政府便趁机整编。由于被控图谋推翻政府,布朗热将军于是跟着情妇逃往比利时;当情妇于1891年逝世时,布朗热将军便在她坟前饮弹自尽。

布朗热主义就某部分来说是出悲剧也是喜剧,有着鲜艳色彩的游行、集会与泛滥的文字宣传,很难仅以法国政治美国化来形容。它加速了旧式保皇派与拿破仑主义者的式微,协助培育了新一代被群众政治接受的好战民族主义。一位史学家认为这是在慢慢导出德雷福斯事件的年代中使法国右派转型的“重大突变”之一,另一位学者则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雏形。为了和社会主义者在经济变动中争取盟友,布朗热主义者和其他新民族主义者组成政党,并且对国际关系与阶级斗争理论充满敌意。借助于爱国联盟之类的组织(爱国联盟是个涉猎政治的健身团体),他们呼吁群众重振祖国的体育与德育,并谴责共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软弱的、分裂的,是已遭国内外敌人污染过的。法西斯主义也许不是诞生于19世纪末,但许多法西斯主义者却是,而从布朗热将军到德雷福斯事件之间的这段时期则提供了策略训练的根基与培养偏见的温室。^①

就像航行在墨西拿(Messina)海峡与卡律布迪斯旋涡(Scylla and Charybdis, 编按:斯库拉,希腊神话中海上半人半兽的女妖怪,据说住

① 参见:René Rémond, *The Right Wing in France from 1815 to de Gaulle*, trans. James M. Laux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5), pp. 205—232; Zeev Sternhell, *La Droite révolutionnaire, 1885—1914; Les Origines françaises du fascisme* (Paris: Seuil, 1978); and Patrick H. Hutton, “Popular Boulangism and the Advent of Mass Politics in Fr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1 (1976), pp. 85—106。汉娜·阿伦特同样将19世纪末的“暴民”与集权主义联系,参见:*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vest, 1973), pp. 106—120。

在面对着西西里岛海上卡律布迪斯大漩涡的墨西拿海峡的洞穴中,躲避卡律布迪斯漩涡的船只(一靠近洞穴,船员就会被吃掉)中的船只,共和派的温和政府设法在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开辟一条中间路线。同时,政府亦受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他们当中有些曾支持布朗热将军,但大多数则是追求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与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使用残暴的字眼和激烈的行动。他们用浪漫风格的短论思索着未来的启示,并宣称社会“已腐败堕落”;但是他们仍对一般大众缺乏兴趣,直到“炸弹在逐渐增强的不合理压抑与报复中开始爆炸”,而城市恐怖活动便在这美丽年代的摇篮中浮现。^① 1882年无政府主义者在里昂受审后的十多年间,“行动宣传者”袭击政府官员、炸酒店及餐馆,并从国民议会的旁听席抛掷炸弹。1892年至1894年间,巴黎发生了十一次爆炸事件,而1894年夏天,一名持刀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报复法国同志遇害,在里昂行刺了第三共和总统卡诺(Sadi Carnot)。国会最后不顾左翼分子的抗议,颁布了一系列“恶棍法”(lois scélérates),禁止鼓吹无政府主义。

一如巴黎公社的结果,政府的压制很有效,但是痛恨法国的政治分裂仍残存延伸至文字和讽刺画的战场——这也是德雷福斯事件所引发的内战的重要战场。1881年的新闻法案解除了不少政府的限制,一场新闻革命便跨过19世纪。识字率的提高和新印刷术改变了传媒企业,数以百计的日报及周刊(《小报》[*Le Petit Journal*]每日印量超过一百万份)吸引了大批迫不及待的新读者,其中不少读者相信他们所读到的信息。在19世纪90年代,报刊的销售量急速增加,以致纸张批发商需要每日增加一百吨原料以应付市场所需。当时报刊价格低,随处都可买到,乡村农庄也不例外。支持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的报刊都有(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直至1894年才停刊),并且刊登广告、富于娱乐性的长篇连载以及轰动社会却牵强附会的

^① Eugen Weber, *France, fin-de-siècl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1986), p. 115.

头条新闻。在这个依靠人民的忧虑而兴旺的时代,报刊大肆利用丑闻并搜寻代罪羔羊。^①

法国并不缺乏丑闻或代罪羔羊。在布朗热逃亡到德雷福斯被捕这段期间,另一首“芳香的插曲”揭露政治的腐败——一如在帝国时代——已在共和扎根。^②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巴拿马运河公司试图重演创办人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二十年前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成就,但是热带疾病及资金短缺扰乱了整个计划。受人敬重的雷赛布用合法的渠道(大部分)筹募资金,但巴拿马运河公司的一群说客则向政客恐吓,逼迫国民议会批准利用奖券贷款。贷款起初进行顺利,接着失败,公司宣布破产,成千上万的小额投资者血本无归,当局开始追捕巴拿马公司那些衣冠楚楚的大盗。新闻报告将注意力集中于两位职员,他们被控贿赂百余位议员并幕后策划掩盖事实真相。虽说赫茨(Cornelius Herz)及雷纳克男爵(Baron Jacques de Reinach)确实行贿,但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是另有目的的。此时法国不单在巴拿马计划上失败,也遭逢西方工业国家因罢工而导致的第一波经济衰退,而赫茨和雷纳克男爵正好适合扮演内贼的角色。雷纳克男爵的祖先来自德国,而赫茨虽然生于法国,却已入了美国籍;然而,对于喜欢以简单答案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犹太人。

19世纪下半叶,反犹太主义者由于近代接受的谴责而加剧了他们对犹太人长久以来的偏见。一百年前,有两道具有革命性的法令取消对法国犹太人的一切禁制,有史以来头一次任何犹太人“只要以公民身份宣誓效忠并服从宪法”,便可享受完全的公民自由权。有位法籍犹太人在获得解放后写信说:“法国,是洗刷犹太耻辱与解开所有俘虏脚镣的第一人,她是我们的以色列,她的山是我们的锡安山,她的河是

① 有关当时大量的报纸与宣传的研究,参见:John Grand-Carteret, *L'Affaire Dreyfus et l'image* (Paris: Flammarion, n. d. [1898 ?]), p. 7 and passim.

② 这个名词来自 Gordon Wright, 参见: *France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p. 240.

我们的约旦河。”^①这几句话写尽了犹太人的感激之情,这份感激至下一世纪仍强烈不已。

然而,新法令并不能铲除根深蒂固的偏见,人们仍相信犹太人构成了“国中有国”,是一群不愿被同化的神的选民,并且不太可能放弃那些“耻辱的标记”;如同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些标记)标明了他们是犹太人”。到了19世纪末叶,过去顽强的偏见加上了种族歧视的新元素。“反犹太主义”这个名词虽是在此时期由一名德国人创造出来的,却是由法国人普及流传开来。有位史学家说:“当种族歧视在各地蔓延之际,法国……像是注定要成为种族歧视影响国家政治的其中一员。”^②

当圣经、神话、艺术、文学把犹太人描绘成叛徒、杀害耶稣基督的人与贪婪的放高利贷者时,当代的反犹太主义者则重整这些刻板印象,以对应到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和种族研究的假科学;他们辩称犹太人只效忠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并且只信奉礼拜财神。自图斯内尔(Alphonse de Toussenel)在19世纪中叶抨击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 编按: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后,不论右派或左派都一致谴责“四海为家”的犹太人掌控了社会的上层经济。其后,在德雷福斯事件的严峻考验中,左派的反犹太论调渐渐沉静下来,但是在此之前,左派人士坚信一如马克思所说,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的“小贩”;而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则说,犹太人是“人类”大敌^③,从该世纪的政治、工业及经济等变革中获利。事实上,不少犹太人确实获利匪浅,但许多天主教徒也一样。反犹太分子不仅漠视这个

① 参见:Paul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4—46, 103—108; and Michael Burns, *Dreyfus: A Family Affair, 1789—1945*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pp. 10—13.

② George L. Mosse, *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p. 150.

③ 普鲁东的部分转引自:David Cohen, *La Promotion des Juifs en France à l'époque du Second Empire* (Aix-en-Provence: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1980), p. 653. 另请参见: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ed. T. B. Bottomo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p. 3—40.

事实,更喜爱引述一间由天主教徒管理却破产的联合通用(Union Générale)投资银行为例;经济危机使得这间银行在1882年宣布倒闭,但人们谣传是犹太人密谋摧毁了基督教对手。

铁闻需要散播者,当神职人员继续在圣周礼仪中象征性地鞭打犹太人时,专业反犹太主义者则应用连篇累牍、短篇社论、荒谬漫画及竞选宣言。身为小说作家、布朗热主义政客的德雷福斯敌人的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以“对法国国魂及国土构成威胁”来形容犹太人,他这句话是在竞选活动时说的,这时恰好是德雷福斯事件的高峰期;实际上,他只是复述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制式言辞。

竞选演说

(巴雷斯,1898年11月1日)

各位选民,为了反对那些从政目的仅为满足憎恨之心与其动机仅因统治欲望的政客们,我今天再次带着那些一向赞赏而今天亦不会否认的“国家”与“社会”观念来到这里……

在社会的顶层如同各省内地,在伦理常规上一如物质秩序,在商业、工业、农业及建筑营造上,法国工人面临有如寄生虫、正在毒害我们的外国人的竞争。

新法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元素应是在外来侵略中保护所有公民,并且防止极端世界主义者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极端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将会削弱祖国的防御。

犹太问题是与国家议题有关的。法国大革命时,犹太人借着正直可靠的法国人提高地位,但他们保有他们的特性,一度曾受迫害的他们现在反成了恶霸。我们支持良心的完全自由,但我们认为给犹太人特权去诉诸大革命宣扬的公民自由原则——并可依其诉请保护——是非常危险的。犹太人违反这些原则……因为他们惯于独占、投机并以四海为家,而且在陆军、

司法部门、内阁及所有行政机关中,他们的人数远远超出一般人口比例所规定的名额。他们曾被任命为行政首长、法官、财政官、警官,只因他们有钱行贿……(我们)必须铲除这种危险的不平等现象,获得更多对我们正直的公民即高卢而非犹太子孙的尊敬……

二十年来,机会主义者的政治制度施惠给犹太人、外国人及世界主义者,犯了这大错的人辩解说,外国人为法国带来冲劲活力。某些好的元素……使我们堕落了!事实的真相是:法国社会所需的冲劲活力可以在法国自身找到,我们可以扶助最穷、最潦倒的人,给他们提供专业训练,协助他们享有幸福福祉。

民族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我们界定社会主义为“使最多人与穷困阶级得到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改善”。

经过多个世纪的努力,法国已经有能力为她的人民提供政治保障,现在她必须在经济不安中保护他们。

本文译自:Maurice Barrès, *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 (Paris: Félix Juven, 1902), pp. 432—434。

另一位法国新民族主义的代表是德吕蒙(Edouard Drumont),他是欧洲19世纪末最有力的反犹太主义者。1892年,他通过自己的畅销报《自由言论报》(*La Libre Parole*)发表了《为了法国人的法国》,批判巴拿马事件幕后的“犹太阴谋”,并协助将赫茨驱逐出境,将雷纳克逼得自尽身亡。早在六年前,德吕蒙即写了一本当时最畅销的书——《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这本书第一年便卖了十万本,到了19世纪末已是第二百版,连最保守的家庭都将这本书连同圣经一起放在书架上。这本书写得极其详细、生动,上下两册巨著的攻击焦点围绕在所有的外来威胁上——不分教派的憎恨,从普鲁士的贵族地主、英国的零售店老板、到“越过阿尔卑斯山来窃取法国人工作的意大利人”

(在19世纪末的法国,意大利人是所有外籍人士中最易被攻击的箭靶,而新闻界更是助长此种气焰),而德吕蒙则是针对“有史以来”犹太人一直在毁灭法国加以批评。

详细分析了亚利安人与犹太人的冲突后,德吕蒙将叙述转移到当时的情况。借由革命的解放与从工业资本主义中获得实力,犹太人掌控了共和。东欧与中欧的“鹰钩鼻民族”——多半是为了躲避1880年至1881年的大屠杀而逃到法国的正统犹太人——污染了国家,德吕蒙写道,“就像宿主上的细菌一样”。而在法国成家立业的犹太家庭虽然有很好的掩饰,实际上与那些“为了某些仪式谋杀而聚集,并且当牺牲者的伤口正为普珥节的小牛(原文如此)流着基督徒纯净鲜红的血液时仍谈笑风生、留有卷曲刘海的加利利犹太人”^①没什么不同。

为了强化犹太人的威胁,德吕蒙及其追随者更设计出他们自己的人口统计学。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他们知道在仇视外国人的场所中,“虚构总是较事实更为重要”。^② 德雷福斯事件前夕,在法国的犹太人大约只有八万,或者少于法国人口的两千分之一,但是《犹太法国》将数字提高到五十万(德吕蒙的一位助理还把它提高到六十万)。当大多数在法国东部大城小镇中和在巴黎市中心的犹太人都很贫穷或仅在中产阶级边缘时,反犹太人士把焦点集中在犹太金融人士及政客身上。

同样有效的方法是歪曲事实,尤其是当大多数读者无法进行验证或无心这样做时。自从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以来,犹太人即以优异的表现法国军队中服役,他们毕业于法国最著名的学府如圣西尔军校(Saint-Cyr)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包括1880年的

① 德吕蒙的作品中充斥了这样的言辞。参见: *La France Juive: Essai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2 vols (Paris: Marpon et Flammarion, 1886)。有关“加利利的犹太人”的描写转引自: David S. Landes, “Two Cheers for Emancipation”, in *The Jews in Modern France*, ed Frances Malino and Bernard Wasserstein (Hanover, N. 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5), p. 298。德吕蒙指的应该是逾越节而不是普珥节(犹太教的节日)的面包,但这并不会模糊他的观点。

② Robert Byrnes, *Antisemitism in Modern France*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93.